

众声喧哗里的中国形象

丁一珍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24

摘要: 印度当代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的“鸦片战争三部曲”将历史与想象像结合,重新书写鸦片战争这一时期的宏大历史,小说主要以印度视角为主,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中国。截至目前,“三部曲”的前两部已分别译为《罂粟海》、《烟河》出版,本文从两部中译本出发,分析作品是如何表现作为个人的中国人和作为集体的中国的形象,进而探讨其中体现出的作家立场和我们当下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

关键词: 阿米塔夫·高希;《罂粟海》;《烟河》;中国形象

《罂粟海》(Sea Of Poppies, 2008)、《烟河》(River Of Smoke, 2011)、《战火洪流》(Flood Of Fire, 2015)是印度当代作家阿米塔夫·高希(1956-)创作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都集中书写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因此也被合称为“鸦片战争三部曲”。小说跨越加尔各答、航船、广州三个空间,涉及到印度农民、黑人水手、印度商人、英国艺术家、英国商人、中国商人等来自各国各界的人物。虽然小说的书写重心主要是来自印度各阶层的人民在历史中的遭遇,中国人在其中也着墨颇多。截至目前,三部曲的前两部已分别译为《罂粟海》、《烟河》出版,本文从这两部小说出发,分析作品是如何表现作为个人的中国人和作为集体的中国的形象,进而探讨其中体现出的作家立场和我们当下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

一、作为个体的中国人

“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视角来反观历史”^①是小说的主要叙事方式。印度农妇迪提、黑人混血水手扎卡里、印度王公尼尔、印度商人巴拉姆……小说为众多人物立传,试图通过人物群像真实展现处于历史大河中的各类人物的曲折经历。较之于印度人物,小说对中国人物形象的描绘略显单薄,有时甚至过于单一,但这种单薄来自于作家对中国的认识不够充分,而非先入为主式的文化偏见。

阿发是众多被鸦片戕害的普通人的代表。阿发是孟买商人巴拉姆同丹族寡妇池梅的私生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和孟买商界的地位,巴拉姆始终没有让外界知晓这段婚外情,继续将池梅和阿发安顿在广东。胡龙金(阿龙)是巴拉姆与池梅之间的一位间接联系人,也是

池梅的外甥,巴拉姆给了阿龙第一块鸦片,并且告诉了他鸦片贸易的存在,至此阿龙干上鸦片走私的行当,并且将阿发也引上这条路,加入到走私团伙之中。阿发和走私团伙老板的情人阿德丽娜产生私情,被发现之后开始逃亡的生活,先后流亡到澳门、印度,直至染上毒瘾,被关在加尔各答的拉尔巴扎监狱之中,深受鸦片折磨:“接下来他的皮肤下似乎起了火,他就会抽打自己的全身,好像是想拍熄蔓延的火焰。等这种抽打丧失效果后,他的手就会变成利爪,扣进自己的皮肉中去,好像是想撕掉那层烧焦的皮肤一样。”^②毒瘾发作时的阿发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痛苦万分。在小说的最后,阿发终究没有能够逃脱老板的追杀,葬送了生命,他的母亲池梅也受其牵连而不幸被杀害。阿龙和巴拉姆、英国走私犯詹姆斯·英尼斯合作走私鸦片被清政府发现,其他二人都逃离了惩罚,阿龙却被判处死刑,在被判刑之后,他主动要求在广州十三洋行的广场上公开处决,以示众人。在小说中,阿发背后的种族、国家、身份内涵被隐藏起来,中印混血儿的人物设置本身也在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隔阂。阿发成为了无数在历史中挣扎的小人物之一,他和迪提的丈夫胡卡姆·辛、巴布鲁的三个哥哥一样,都是无法抵制鸦片诱惑而吸食成瘾,早早葬送性命的普通人,池梅、迪提也成为了鸦片贸易下没有名字的无辜牺牲者的代表。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林则徐是两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中国人,在小说对中英双方就鸦片贸易进行博弈的描绘中,他是中方的重要代表,其形象大多通过他人的话语间接呈现,虽然较为单薄,从中也可以窥见作者对于这一人物的尊重和力求客观描绘的努力。《烟河》的第三部分以林则徐为题,在他正式出现之前,其形象已经出现在各类人的对话之中。在英语出版社经营者康普顿(梁凯川)和广州商行代表潘启官口中,他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和学

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2021,项目编号: CXZZSS2021029)

作者简介: 丁一珍,文学硕士,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

者”^③，“不但两袖清风，而且是一位少有的敢于直言、不惧黄威的朝官”^④，在英国商人看来，他是傲慢落后的清朝政府的代表，必须要得到教训。作者笔下的林则徐，仍然有着自诩中国为天朝大国的傲慢，但毫无疑问，他是正义一方的代表。这两部小说对另一位中国人康普顿的描绘很少，他是中国爱国之士的代表，力求根除鸦片贸易，更多的是在扮演尼尔思想转变的促成者的角色。

小说注重对鸦片贸易中各类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式的展示而非深度挖掘人性的复杂，中国人也是全景中的一部分，虽然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但相对客观真实。

二、作为整体的中国

作为鸦片贸易的重要市场，中国更多的时候是以整体的他者的形象隐含在小说之中。作品用大量篇幅刻画了以巴拉姆等人为代表的印度和以威廉·渣甸等为代表的英国对鸦片贸易的看法，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小说展现了英国如何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推行霸权政策，其以先进自居进行不平等、非道德的鸦片贸易，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以自由贸易的名义确保自己国家的利益、进行对外扩张是英国的常用手段。19世纪初期，为了将印度变为自己的商品市场，英国政府曾一边鼓吹自由贸易，一边实行差别化关税，使得当时在国内占据主要地位的印度棉纺织业的市场逐渐被其占领。在小说中，英国商会将自由贸易与人类权力、耶稣基督等同起来，强调其适用于包含鸦片在内的所有产品，无视中国政府禁止走私鸦片的禁令，并且宣称商会“这个组织是为了辅助贸易与商业往来。我们不受任何司法管辖，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原则”^⑤，而在谈及其在本国是否可以自由从事走私贸易时，又傲慢表示不应该“把英国的法律与暴君的一时兴起相提并论”^⑥，其间的本国至上的强盗逻辑一览无遗。在小说中鼓吹这种逻辑的威廉·渣甸^⑦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是“被时人誉为铁头老鼠的贩毒头子，走私发了大财以后，荣归故里，当选为国会议员，推动对华战争不遗余力。当时他最能打动人心的战争借口就是自由贸易，因而得到英国工商界的广泛支持。”^⑧作者以小说的形式戏虐地揭露了英国在鸦片贸易中的双重标准与虚伪面孔。

印度是鸦片的重要原料产地，在《罂粟海》的开头，作者就借助印度农妇迪提的视角描绘了英国工厂主如何采用各种手段强迫农民种植罂粟而非其它农作物，商人巴拉姆也是因造船业受英国人的垄断转而在海外贸易上寻找新的商机。在小说中，中国更像是印度人为了维持其在英殖民统治之下的艰难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的牺牲品。巴拉姆始终在寻找借口证明自己所从事的鸦片贸易的合

理性以慰藉良心。最开始，他表示中国人民并不反对鸦片贸易，甚至中国统治者本身也从中获得了巨额利益。在了解到中国人民对鸦片的憎恶和中国政府禁烟的决心时，他又借口说即使自己中止了鸦片走私，仍会有其他人继续，回避正是由于这些鸦片商为了利益将鸦片带入了中国，中国人才吸食成瘾的客观事实。当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被击碎，自愿交出货物已成定局之时，巴拉姆无奈地袒露了真实心声：“我把灵魂卖给了阿里曼……但结果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⑨阿里曼是巴拉姆信仰的拜火教中代表黑暗的恶神，在小说的最后，他终于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违背良心的邪恶贸易，而这种贸易哪怕有一丝继续进行的可能，为了使自己 and 背后的投资者们不至于濒临破产，巴拉姆都将继续与阿里曼为伍，在利益面前，遥远的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危显得微不足道。

作者在展示中国在鸦片贸易中的受害者的角色同时，并没有回避中国社会自身的种种问题。与处处宣扬大英帝国的优越性的英国商人一样，此时的中国也时时以天朝自居，中国政府甚至愚昧地认为英国人的生存离不开大黄这种植物。在林则徐写给英国女王的信中，仅仅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道德说辞谴责英国的鸦片贸易，可见其对于国际现状与发展潮流的认识的愚钝。此外，就像巴拉姆所认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政府确实从鸦片贸易中获利，“从严禁到弛禁到开禁再到自种自吸，中央及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收税利益，使鸦片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一些现代化的建设其背后的财政支持竟来自鸦片税收，历史是如此的尴尬、悲哀。”^⑩

小说在力图全面、客观的展示中国在中、英、印三国中的角色，重申鸦片贸易的历史。无论对于印度还是英国来说，当时的中国都是一块资源丰富、陌生神秘而有待探索的宝地。在英、印、中三国就鸦片贸易展开的博弈中，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下，中国深受英国霸权政策的压迫，同时印度也染指其中，深深地威胁了千万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

三、历史的反思

高希选择以鸦片战争作为大背景创作小说，是为了提醒印度人民不要忘记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同时，印度视角的展示也丰富了中国读者对鸦片贸易的认知，其中的中国形象也在间接提醒我们，历史虽然成为过去，但其背后所显示的霸权主义思维模式仍需警惕。

时至今日，否认鸦片战争与鸦片贸易有关的论调仍然在英国国内受到部分人的追捧。19世纪中期，英国民众与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鸦片的严重危害，1968年英国议会通过的《药房法案》将鸦片正式列为毒品。与此同

时,在另一方面,英国却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并且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方式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无数中国民众成为英国巨额利润下的牺牲品。此时期的英国文学作品在极力丑化中国,决口不提鸦片贸易的存在。“中国人都是恶人:他们极不诚实,礼貌只是出于虚伪,微笑都是鬼脸怪相。如此普遍的弑婴和乞讨行为都证明了他们是麻木、冷漠、自私并且毫无慈悲之心的人。”^⑩。以文学、报刊等媒介为代表的文化力量与政治合谋,在潜移默化中将“意念中的恐慌转化为现实中的确信,中国人不断被妖魔化,并被英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引为宣教的噱头。”^⑪,共同在民众中打造了强调侵略的合理性的虚假帝国话语。话语也是重要的政治武器,至今,仍有部分英国学者以维护英国安全、推行自由贸易为名强调鸦片战争的合理性,遮掩其背后的鸦片贸易的事实,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仍十分复杂。发挥文化的力量,用冠冕堂皇的话语粉饰利己主义的霸权行为是西方世界的常用手段,如何让鸦片战争式的历史事件不再重演仍是全球化世界下的各个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就像作者在采访中指出来的那样“当殖民力量成为一种国家认同,并且为了控制一种有利可图的自然资源而不惜发动战争时,伊拉克战争和曾经的中国当局试图控制的处在经济和政治冲突之间的鸦片贸易是如此的相似。”^⑫

同时,小说成功地将印度纳入到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的历史之中,使中国读者也注意到了印度在其中的暧昧角色。同英国一样,很大一部分印度人民都没有了解到印度也是鸦片贸易和战争的参与者和获利者,更不要说认识到其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在对历史的掩盖和回避的背后,反应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内在心理。在主动了解西方世界的历史与文化的同时,读者也不能轻视印度这一极具发展潜力的国家。

忘记历史的地方是阿里曼的王国,是“在遗忘与空虚的沙漠里一场无休无止的表演”^⑬。作者在提醒印度民众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历史的重要性,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人类处于困境中的具体事例”^⑭。同样的鸦片战争,在不同国家的主导下却有着不同的诠释,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潮流之下,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在,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提醒印度人民鸦片贸易对当代印度社会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作者写作小说的目的之一。作者展示了英殖民时期的霸权政策和中印两国人民受到的伤害,也描绘了印度在鸦片贸易中所扮演的帮凶角色。总体看来,作者对待中国持亲善的态度,其对鸦片战争前后这段历史的文学书写也帮助我们再次从当下的视角重新审视过

去,思考现在。

注释:

①金万锋译《游走于档案与想象之间——阿米塔夫·高希访谈录》,载《世界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②[印度]阿米塔夫·高希:《罂粟海》,郭国良、李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59、260页。

③④⑤⑥⑨⑩[印度]阿米塔夫·高希:《烟河》,郭国良、李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34页,第253页,第299页,第440页,第444页,第450页。

⑦老牌英资洋行怡和洋行的经营者。

⑧黄宇和《21世纪初西方鸦片战争研究反映的重大问题——从近年所见的三部鸦片战争史研究著作说起》,载《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⑨韩倩,《鸦片的多重面孔》,载《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2019年第1期。

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⑪郑宇丹《19世纪的英国:鸦片观念变迁、大众传播与帝国话语建构》,载《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⑫Tim Teeman: Amitav Ghosh Talks to Tim Teeman about Colonial Wars, Imperial Power and a Controversial Literary Prize, The Times, 2011(6).

⑬金万锋译《游走于档案与想象之间——阿米塔夫·高希访谈录》,载《世界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阿米塔夫·高希.烟河[M].郭国良、李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阿米塔夫·高希.罂粟海[M].郭国良、李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韩倩.鸦片的多重面孔[J].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2019(1).

[4]黄宇.21世纪初西方鸦片战争研究反映的重大问题——从近年所见的三部鸦片战争史研究著作说起[J].清华大学学报,2013(1).

[5]金万锋译.游走于档案与想象之间——阿米塔夫·高希访谈录[J].世界文学评论,2016(3).

[6]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郑宇丹.19世纪的英国:鸦片观念变迁、大众传播与帝国话语建构.清华大学学报,2019(2).

[8]Tim Teeman: Amitav Ghosh Talks to Tim Teeman about Colonial Wars, Imperial Power and a Controversial Literary Prize, The Times, 2011(6).